

老院的右派

文 | 袁凌

一

在北皋公交站下车，穿过机场高速的桥洞，洞顶很低，穿行着拖拉机和人力三轮，和桥面上是两个世界。

穿过一片有零星垃圾的空地，沿着边缘被烧焦的枯草地往里走，能看到把守养老院门口的两座石狮子。紧靠大门里边是一个小卖部，提醒来人要买点东西。

售货员的表情和半空的货架近似，蒙着一层莫名的灰。商品只有罐头、香蕉等三四类，我买了这两样，手上似乎有了信物，可以去打听房间号了。

走廊里有一种气味，和小卖部的类似，只是似乎更厚些。房间都披着厚门帘。掀开其中一间的门帘，几个老人躺在各自的床上。旁边各有一个床头柜，靠墙的台子上有台没有打开的电视，墙壁上有台夏天用的风扇。人和东西一动不动，被我掀动了一下的空气，也很快回到停滞的状态。

原来走廊和商店里的气息是房间里多余的散发出去的，这些睡着的老人确实不需要很多空气。

周培桐是其中醒着的一个，原来他就睡在脚头迎门的那张床。他只是眼睛睁开，身子其他部分还在被子下。一动不动的空气里，下半截被子在微微抖动。后来知道，这是腿部神经损伤造成的。

我说明是受人之托来看他，他微微回应，表示记得这位女同学。我发现让他说话是一件困难的事情，仅有的几句回答是擦着口齿挤出来的。

委托我的是倪竞雄，她是林昭在苏南新专的同学，也是周培桐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同学。上次来北京参加 90 周年校庆，她去看了林昭的塑像，另一件事是想见周培桐，但得知他已住进郊外的养老院。

“他很有才华。”在三里屯附近一家宾馆的电梯里，八十岁的倪阿姨说起周培桐来，眼睛里有金属壁的反光。

她记得当年课堂上的那篇文章，周培桐用了一个特别的词来比喻海上日出，和巴金的描绘不一样，却又正是她心里想不出来的。

我对周培桐提到这个，他严肃得有些僵硬地回答：“才疏学浅。”只有这么四个字，似乎显示了某种旧日气度，但刻板的口吻却又完全否定了一切过往。

离开课堂不久，周培桐被打成了右派，起因是一篇投给《人民文学》的讽刺小说。文学之梦就此中断，那堂课或许是生涯中仅有的光亮时刻，保存在一个女同学心中，他自己却淡忘了，想不起来那个出众的比喻。

成为右派之后，他从文化部被发配到青海，跟在中南海的学生舞会上认识的妻子离了婚，然后被下放到祁连山腰下的八宝劳教农场。周培桐和另一个右派负责赶大车，从冰川往农场运水。一次下坡途中，翻倒的大水桶压住了周培桐的左腿，他失去了知觉，醒来之后继续干活，腿却使不上劲了。

这条伤腿眼下在被子底下微微颤抖，神经损坏造成的瘙痒没有一刻的间歇。他的双手一直留在被子下，身体固定在床上，一根黄色的管子露出被角，连着床下的尿袋。

我带来的罐头和香蕉放在床头柜上，他似乎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。进来查看的护理员说，他喜欢喝酸奶，继女给他拿的，现在床头柜里还有。但周培桐说，也就半个月拿一次。

感觉他和继女有些隔阂，就像对于我或者病床之外的世界保留着戒心，只留一条艰涩的缝隙。

对面单人床上的老人睡得很死，脸搁在床沿，发出呼呼的喉音，过一会儿中断了，翻一个身继续。我进来之后一点没有扰动他。走到里间，一个老人蒙着头，一个人的被子褪到了胸口，眼睛紧闭。房间里有一股隐约的大便失禁的气味。

二

“他的念想是一本书。”倪阿姨说。

这本书名叫《来自卡斯提尔的队长》，是周培桐在下放到天津烧锅炉期间翻译完的。我在网上查到了这本西班牙小说，写的是自由城邦时代反抗王权的故事，穿插着一对恋人的悲剧，1940年代曾经改编成好莱坞电影，走红一时。

第二次去，遇到继女一家来探望，两个大人和一个小女孩。继女说正好，我们要走了，你和他聊聊。女孩叫了一声：“爷爷，我们走了。”周培桐躺在床上，望着他们离开。在他瘦削的脸上，看不到神情线条的变化。

我送他们到走廊里，和他女儿聊了一会儿，她告诉我那本译稿眼下在托日本一个朋友找地方出版。上次倪阿姨曾经表示，是不是找几个同学凑万把块钱，给老爷子印出来算了，让他生前能够看到。“老爷子基本是‘干了水汽’了，就靠这个念想在坚持。”这个钱她们自己也出得起，不过觉得自己印意思不大，还是想找路子出。

我回到房间，看不出这儿和第一次来时的变化，除了床头柜上的一盒酸奶。护理员说是一会儿让他吃，别的装在柜子里了。周培桐看见我进来，张开了眼睛。

我问：“你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不好。”

“怎么个不好？”

“江河日下。进来头半年还能活动，干点轻体力劳动。现在是一步步往下掉，只能躺在床上。”

我揭开一点被角，看到他的腿确实像继女说的“干了水汽”，似乎已经不是皮肉的质地了。这条看似没有知觉的腿仍旧在微微颤抖，就像一种完全无关的东西在操纵它。

我提到那本书，说到倪阿姨的主意。他的眼睛忽然张开了，放出耿耿的光线，同时“嗯”了一声，像是整个人一下子打开，注意捕捉着我说的字。在这一瞬间，他和这张病床脱离了关系。我注意到他花白的眉毛有几根非常长，为眼神的精光平添了一份凌厉。早年的那个周培桐一瞬间复活了过来，让人依稀想到倪阿姨说的课堂上的才气，以及写小说批评领导的锐利。语言也变得流利了——即使经过了这样长年的消磨，有些东西也并未全然死掉。

这份光亮慢慢地平息下去，他说到了在锅炉房翻译这本书的往事。年轻的时候，他看到了这本书的西班牙文原版，很喜欢。大饥荒年代，从青海农场自行回到天津后，他和一个姓窦的伙伴搭手烧锅炉，也搭伴生活，一边开始翻译。姓窦的伙伴从小是个孤儿，在基督教会长大，因为这个成了右派。烧锅炉的时候，他还时常祈祷。以后平反回到北京，他和一位原来的女同学结了婚，年纪也已经大了，没有亲生子女。女同学过世以后，他重新回到天津，和老伙伴一同生活，直到腿病加重，进入这所养老院。到这时，因为缺乏资料，这本书还有一截尾巴没有翻译完。

他并不愿意进养老院，始终怀疑继女是为了落得他的一部分养老金。他觉得住在郊外的这座养老院花不了几个钱。但护工的说法却与此两样：这里虽然夏天没有空调，房间也朝北，冬天的暖气并不充足，但床位费和护理费并不低。

如果让他选，他宁愿回到天津，和姓窦的同伴一起生活。“他愿意自我牺牲。我们在一起，互相牺牲。”

但眼下在这张病床之外，他已经没有机会。

三

开春的阳光，把敬老院大门铁栅栏的影子疏淡地铺在地上。一溜老年人在朝南的屋檐下晒太阳，一律穿着青灰和黑色，戴着帽子，人缩在领口里，不怎么看得见，像是一堆拿出来翻晒的陈年被服。我想，前几年这些人里大约有周培桐。

走廊里气味依旧，春天隔着墙壁，穿透不到这里。走进印象中的房间，迎门的床上躺着另一个老人，我怀疑自己走错了。其他几张床上，仍是以前来时昏睡的脸。问他们，一句话也不回答，似乎自己已经和这个世界无关。

在走廊里找到护工，她想了一会儿说：“周老头死了，弄走了，年初的事情。”

我心里空落了一下，带来的几瓶爽歪歪酸奶又拎了回去。走出敬老院大门，给他继女打电话，确认了这件事情，又电话告知倪阿姨，她吃了一惊，过一下说，周培桐比自己小一岁。

春天的草地有些发绿了，但仍然显出枯黄的底色，边缘缀着焚烧的痕迹。这片草地从来没有摆脱过荒凉。

我要了天津窦姓老人的电话，过了一段时间打过去。电话里一个苍老到了尽头的声音说自己耳朵聋，不太听得懂话，让我回头打给他定期来料理的侄子。我说了周培桐的名字，他说：“知道，他死了。我们以前好。”

《来自卡斯提尔的队长》没有出版。